



基督教哲学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确立

2005年11月19日

来源:世界弘明哲学季刊

作者:王荣江

作者其他文章

暂无

栏目广告6, 生成文

件 HTDOCS/NEWXX9.HTM 备用,

王荣江 (博士)

中国淮阴师范学院政教系副教授

210093 中国南京大学哲学系

【提要】 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在逐步摆脱由古希腊哲学形成的理性至上的“本质先于存在”的本质主义认识路线转向“经验至上”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认识路线的过程确立的, 其中, 基督教信仰为这一转向提供了契机: 奥古斯丁的“相信以便理解”为后一种认识路线提供了必要前提, 而托马斯的“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对后一种认识路线的确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来的学者正是沿着这一思维方式前进, 并最终结出近代科学这一硕果。

【关键词】 近代科学 思维方式 基督教哲学 本质与存在 理性与经验

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1]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反而导致一种怀疑主义的后果。这种本质主义的认识方式, 轻视感觉经验的外部世界, 试图通过人的逻辑理性去把握事物背后不变的本质。近代科学认为, 事物背后的不变的本质其实是不存在的, 人们只能在现象的经验范围内通过数学的量化处理来把握现象之物。

从希腊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向近代科学的经验主义的转变，基督教哲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基督教哲学的思维方式使希腊哲学走出困境并最终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

一 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后果

希腊哲学是以米利都学派的“万物的始基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开始的。这种提问方式蕴涵着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首先是预设了认识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相信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以不可怀疑的方式确立了人对万物认识的至上能力；二是相信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有一个不变的可以认识的本质实在。在此基础上，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找到通过人类理性获得的关于事物本质知识的路线，即如何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米利都学派之后的哲学家都是沿着这样的思维方式向前发展的。

毕达哥拉学派在米利都学派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了一条认识路线，通过对万物的几何结构或形式的认识来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这种本质不仅指事物所保持的形状，而且是给予事物以特殊性质和彼此区别的那种东西。这种对数学的重视过分强调抽象的数及其关系对世界的本质意义，表现出舍弃现象而追求其背后本质的认识方式。巴门尼德在思维与不变的本质存在之间确立了同一性，认为真理之路就是理性思维去获得不变的本质存在的道路。这种不变的本质存在，在柏拉图那里就是他试图获取的理念。这种通过理性的思维去把握事物背后不变的本质存在的思维方式就形成了西方本质主义的认识路线，这样的认识路线使感性的现象世界受到轻视，而执著于观念中的理想对象的本质实在，它实质上是在思维与事物在观念中的理想对象的实在之间建立了一种严格的逻辑推理关系。于是，“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的对象要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2]。

这种理性至上的本质主义，默认并强化了思想本身的可靠性以及认识对象的可能性[3]。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显示着自然界中的合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性——合理性成了实在的标准，而观察和实验都处于次要的地位。其根本特征在于，认为自然中的事物都是合乎理性的，如果我们对一事物不能形成一种不变的本质观念，这一事物便不存在，也不能形成关于对象的知识。这样，人类理性就成了存在的真实性的衡量尺度，思维与存在在本质的意义上被同一，一切现实事物在思想中的存在比在时空中的存在更为真实。这就是一条本质先于并决定存在、存

在等同于本质的从本质到存在的“本质主义”认识路线：只要把握了事物背后的所谓抽象的不变本质，就认识和把握了现实存在的事物，从而达到认识的目的[4]。

这样的认识方式试图在人的理性思维中理解存在，即“理性给自然立法”。那么，它的理论根基或出发点是什么呢？

既然本质主义舍弃了真实存在的现象世界，那么，唯一可以作为这种思维方式之前提的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但这样的不证自明的公理，经过希腊思想家的不懈努力，不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最终都没有得以确立。于是，希腊思想家沿着这样的思维方式试图寻找一种自足的概念作为推理知识的前提，用“逻各斯”来解决如何获得事物本质知识的这一希腊哲学的核心问题[5]。然而，问题不仅没有得以解决，反而在希腊化时期导致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作为希腊思想的遗产，以其应有的惯性释放出来，并达到空前的活跃，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于是，希腊思想终因对理性的执著而陷入困境。

如果说人类理性不能通过对事物背后的本质把握来获得知识的话，那么，我们通过感觉经验能达到这一目的吗？

答案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希腊的本质主义认识方式正是看到了感觉经验的纷繁变化才试图走本质主义的认识路线的。希腊思想家的上述努力和这种努力所带来的后果已经证明，此路不通，人们只能走另一条路线。

二 基督教哲学解决希腊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

当希腊哲学所追求的确定的不变本质知识最终不能达到时，导致了希腊化时期对知识的普遍怀疑。在面临生存危机的世界主义时期，人们因内心的不安而变得无所适从。正是这时，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和发展起来，并最终在罗马帝国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逐步显示了这种信仰在人类生活和思维中的巨大作用。实际上，它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契机。在这种宗教信仰中，不仅人类趋向善的目的性以及道德标准的绝对性，而且，现实世界的实在性都在对唯一上帝的信仰中被给予了。按吕样的说法：“对上帝的信仰同时意味着：（1）现实世界是唯一的世界而且也是真正现实的世界，因为它乃是由上帝亲自所造；

（2）人天生犯有罪恶。因而赎罪的道路就只在于此生此世的奉献；（3）道德上

的善只能由上帝规定，因而任何恶行都必将受到惩罚。在此，基督教的彻底一神论杜绝了人们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道德标准的任何怀疑的余地，无条件地投入生活即是上帝所设定的绝对命运。” [6]

对人类而言，其思想不能没有确定的前提。如果人类理性不能确立这一前提，感性经验必定有它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完全可以通过人对上帝创世的信仰来达到它的确定性。因为上帝乃是纯粹的现实性，它所构想和创造的一切都是现实的，而这种来自万能上帝的现实性也就确保了感觉经验存在的确定性，所以，基督教的传入，一方面为当时罗马帝国的芸芸众生填补了生活的精神空缺，另一方面也为克服希腊哲学中的怀疑论给出了新的契机[7]。这样，人类思想和生活的出发点及其内在动力不是在希腊智慧的知识中得以确立，而是在对上帝的信仰中得以确立。

这种从理性的确定性到通过信仰上帝来达到感觉经验的现实确定性有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这里只对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及其之后的唯名论的思想进行阐述，以探明基督教信仰的思维方式对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

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接触中，奥古斯丁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正是他为柏拉图的知识概念重新给以基础，从而使得希腊思想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成长起来。他首先解决的是由柏拉图极端的本质主义所导致的怀疑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提出“相信以便理解”作为思想的必要前提。

作为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人，奥古斯丁站在两个时代的交界上看到了希腊理性至上给人类带来的生活和思想上的困境，认为：“理性本身是世界上最成问题、最含混不清的东西之一。理性不可能向我们指示通向澄明、真理和智慧的道路。因为它本身的意义就是含糊不清的，而关于它的来源则笼罩着一片神秘——这种神秘只有靠基督教的启示才能解决。” [8]也就是说，理性要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不可能只是诉诸自身及其能力，还必须靠超自然力量的帮助，靠神恩赐的力量。在奥古斯丁看来，一个不接受任何事情为真的人是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任何怀疑与批判都是以某些无可置疑的前提为出发，哲学前提只能是信仰的对象。就信仰本身来说，信仰并非无思想的盲从，它是以相信权威为前提的思想，若无被信仰的前提，也就不会有对信仰的进一步思考和理解。他说：“有些东西必须在相信上帝之前被理解，但是，对上帝的信仰帮助一个人理解更多。……另一方面，有些事情必须先被相信，然后才能理解，正如先知所说：‘除非你相信，否则你将不会理解。’因此，心灵由相信进而理解。” [9]这样，信仰为理解开辟道路，是思维的起点，人的思想从这里出发进行智慧之旅。如果没有信仰，人们势必放弃寻求知识的努力。因而，在对上帝及其创世的信仰

中就构成了认识和获得知识的先在条件。奥古斯丁给“信仰”下的定义是：“以赞同的态度思想”[10]。因而，他坚持“信仰以便理解”的基本立场并不是绝对的：在信仰之前，也需要某些程度的理解，否则人们将不会“以赞同的态度思想”；在信仰之后，更需要对信仰作更深入的理解。

奥古斯丁根据个人皈依基督教的经验充分肯定了人的日常感性知识的确定性，认为即使最初步的认识——感觉——也是可靠的，但感觉的作用只是把事物的外形呈现给我们，并不能要求感觉提供它们所不能提供的东西，更不能要求感觉提供判断真假的标准。他提出“我怀疑，故我存在”的命题，通过人活着及其怀疑的活生生的事实来反驳普遍怀疑的不可能。他把人们获得知识的能力分为感觉和理性两种，认为认识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他说：

“很明显，有形事物被身体感觉所感知，身体感觉不能感知自身；由感觉不但可以感知被身体感觉所感知的有形事物，而且可以感知身体感觉自身。理性却认识所有这一切，并且认识自身。”[11]因而，奥古斯丁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一方面是上帝的全能性确保着作为认识出发点的感觉经验的实在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自我意识确立了感觉经验的确定性。

应当看到，奥古斯丁的直接目的是为宗教信仰服务的，在具体的认识中，他还是沿袭了古希腊思想的本质主义认识传统。也就是说，他的“相信以便理解”仅仅是给人的思维一个思想的前提。不幸的是，这种前提的更深刻的内涵只有在人们对身外的感性世界充满求知欲望时才能显示出它的重大意义。从理性至上发展到信仰至上，这一急剧转变掩盖了人们对这一前提的充分认识和理解，一切都是为了信仰。

在奥古斯丁之后，西方思想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是从托马斯·阿奎那开始的。托马斯是神学的集大成者，但“他的立场是主张哲学消融在神学之中的保守立场与主张使哲学与神学彻底分离的激进立场的折中”[12]。他已明确区分哲学和神学是两门不同的科学，两者是以不同的方式探求真理。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哲学家可以按照人类理性探寻真理[13]，从而为哲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走上自身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当然，一种哲学走上自身的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它必能结出丰硕的成果。托马斯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寻找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方式，为后来科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就是他的关于“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

十三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深入，“托马斯创造性地发挥了亚里士多德实体论的‘存在优先’的基本原则，扭转了长期存在的形而上学中的柏拉图主义的倾向”[14]。根据赵敦华教授的研究，托马斯批判了传统的

本质先于存在、决定存在的观点，按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与潜在的关系理解存在与本质的关系，认为：本质在未获得存在之前只是一种潜在，一种可能性；存在是某种现实性的活动，“因为一事物并不因其潜在而被称作存在，它的存在基于它的活动这一事实” [15]，并且这种活动的现实性也决定了存在的最高的完善性，而不是像传统所理解的存在如何与原初质料一样是最不完善的[16]，因为活动总比潜在更完善，若无具体存在，本质就不会被理解为任何现实的东西。因此，存在高于、优于、先于本质，本质依赖于存在，没有存在就没有实在的本质。

这样，“托马斯颠倒了传统哲学中存在与本质的位置，以一种存在主义代替本质主义” [17]。这种反传统的认识方式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就认识方式而言，既然存在是一种现实性的活动，它高于、优于和先于本质，具有最高的完善性，因而完全没有必要与抽象的本质发生联系而增加自身的完善性，存在有着自身的原因和确定性。这样，人类也就没有必要舍弃现实性的活动去追求现实活动背后的人类理性虚构的本质，而应着眼于现实性的活动，从存在的现实性中认识和把握事物，存在是第一原则。相应地，对这种现实活动的存在的认识就必须以感觉经验为基础，而不是追寻现象背后的抽象本质，这就为以后唯名论的复兴以至科学思想方式的最终产生打下方法论基础。这就是从原来传统的本质优先、把存在等同于本质的本质主义认识路线转变为存在优先、存在不同于本质的从感觉经验中把握现实存在的“存在主义”认识路线。

这样的认识方式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清楚地显现出来的，但它伴随着唯名论的复兴及其对自然研究的深化最突出地表现在十四世纪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一些著作家对物理学的研究中。伽利略沿着这些著作家的思维方式前进[18]，从而做出了物理学上的巨大贡献。这样的认识方式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中得以确立，并最终在康德的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

三 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确立

思维方式中的本质主义的破灭和“存在主义”的确立的实质在于，人们认识到科学决不是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而只能是一个“怎么样”的问题。即：它是一个描述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寻找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原因问题；科学只能描述事物或只求或然性，而不是理性绝对确定性。在古希腊，正是思想家们探寻绝对的确定性使他们舍弃感觉经验而偏执于理性的至上性，最终走入困境。在“存在主义”的感觉经验者如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者看

来，一般观念[19]由于借助于词语就不再直接与事物本身发生关系，基本上只与事物的观念发生关系。可是，在我们的思想中直观地表现个别事物是与事物直接发生关联的。这种表现是否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我们不知道，它们之间可能有真正的相似点，也可能很少与它所代表的对象相似，这完全取决于这种描述结果的经验确证。库萨的尼古拉拥护这种唯名论的观点，认为与事物的真正本质相对立，人类思想只具有“推测”的能力，只具有符合于自身性质的表达方式，而对所有正面判断的这种相对性的认识，对这种无知的认识，作为有学问的无知的第一阶段，是超越理性科学达到不可言传、不带符号[20]、直接认识真正存在的唯一道路。[21]

这里已经表现出反对并否认人类理性认识的至上性和完备性，充分肯定感性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和地位，现象背后的所谓本质实在是形而上学的虚构。这在伽利略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确。

在伽利略看来，科学不同于探究原因的哲学，“科学只是那些可以根据‘感觉经验和必要证明’所建立起来的东西”[22]，科学是用测量理论、实验以及误差理论对问题进行回答的。他认为：“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即使是最微小的——能被我们最有才智的理论家全面理解，那种自命懂得一切事物的人实际上并不懂得任何事物。”[23]他还断言“事物的本质是无法弄清楚的，科学所关心的仅仅是事物的特性和可见事件”[24]，认为我们只能通过人类理智唯一完全理解的数学定理的确定性来展现大自然在运动中的确定性。因此，他的科学完全不同于那种认为任何问题都能得到完全和最终解决的哲学，后者是不存在的，因而任何这样的努力也是徒劳的。科学完全是经验范围内的有关事实的问题，它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哲学的本质、原因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正是这一带有根本性的认识使伽利略将实验与数学结合，从而走向近代科学的思维之路。在他身上已经完全体现出科学是对外界事物在经验范围内的理性的数学建构的思想，这正是从本质主义转向“存在主义”的结果。

这里涉及到人类认识的一个根本问题：人的思想到底是如何反映客观世界并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的？人们通过对自身的形而上学理性的考察及其实践充分认识到，单凭抽象的形而上学理性不能确切地把握事物。科学知识完全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科学是在经验的范围内依据现实的存在将事物某一方面量的规定性抽象化[25]，从而达到有效地把握事物的一种认识方式，它完全是经验范围内的有关事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并不过问事物背后的“自在之物”[26]，它只是对事物在经验范围内的理性的精确描述，我们无法彻底地理解事物。因此，从“本质主义”向“存在主义”转变的第一要义就是从理性至上转变为“经验至上”[27]，经验成了认识的第一原则。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

理性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自身提出的把握事物背后本质的任务，理性是苍白无力的，是非至上的，科学的认识只能局限在经验范围之内。

但是，这样的转变并不是完全抛弃理性，理性作为一种认识手段是人类思维所不可或缺的。在“存在主义”的道路上，正是那些运用理性的数学方法的人使科学走上近代的道路，如十四世纪牛津和巴黎大学的一些学者对“原动力”问题的研究以及伽利略的力学研究等等。而弗兰西斯·培根等人之所以在他们所倡导的经验的归纳法下没有做出科学上的重大贡献，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数学作为一种认识手段在经验的认识方式中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可称近代科学是对客观事实在经验范围内的一种理性的数学建构，只要这种建构能在经验范围内加以确证，它就是真理性的正确知识。这里当然有客观的实在的因素，因为它是对客观实在对象的现实反映，但更多的是主观的理性的数学建构。正是这种理性的数学建构使近代科学在本质上不同于中世纪的学问和希腊的知识[28]，它实质上是一种理性经验论，它同时强调理性与经验的同等重要。正如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所说：“对于详细事实的强烈兴趣，和对于抽象概括的同样的热忱，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新气象。” [29]

这样的理性经验论认识到理性作为秩序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又必须服从在现实世界中业已给定的一切。经验及其存在是第一位的，并要注意到存在的偶然性以及事物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说，近代科学只服从于已知的确实存在的事实，只服从于给定的和已经形成的事物，而不论其是否符合理性，虽然理性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是必要的。这种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认识路线强调在经验的基础上经验与理性的有机结合。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说近代科学从事实开始而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是从一般的思辨概念和命题开始，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也有观察事实、近代科学也用普遍概念和命题工作。因此，古代和近代的科学都关心事实、普遍概念与命题，它们关键的区别是对事实的实在的认识不同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方法的转变。这种理性与经验的重新组合在以后的哲学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经过理性和经验论的各执一端的争论，直到康德那里才以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知性认识；人类理智是一种“推论的知性”，既不能离开经验而思维，也不能离开概念而直观。这样，近代科学及其思维方式在康德的哲学中以确定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一方面表明近代哲学思想是沿着近代科学思想发展的轨道前进的，反过来也证明了以上对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分析是正确的，其关键的步骤就是对本质与存在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

而引起的方法上的革新。正如科学史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他的《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中认为的，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发展到近代物理学，既不能通过单纯的理性至上的哲学形而上学，也不能通过“纯粹照相式的观察方法”，它需要一种不同的“思维图景”和“心理上的转换”。[30]无论是古希腊思想还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心理趋向，都对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向做出了应有的准备，这是一个持续的、不断前进的过程。

[1] 追求所谓的事物背后不变的本质并要求逻辑的论证。

[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3] 对现象背后的本质把握。

[4] 获得确实可靠的知识。

[5] 吕样《希腊哲学中的知识问题及其困境》第1、111~118、129~13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6] 吕样《希腊哲学中的知识问题及其困境》第1、111~118、129~13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7] 通过信仰。

[8]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3~1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9] 奥古斯丁《布道辞》第18章第3节，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 奥古斯丁《论圣徒的归宿》第5章，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 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第2卷第2章第34节，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14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 当然，这时的理性与古希腊时的理性有所不同，它已经不是万能自足

的东西，而只是探寻某种真理的方式和手段。

[14]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375页

[15] 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第1卷第22题，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 因而，存在可以被一切谓项表达的性质所规定而次于本质并被本质所决定。

[17]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381页

[18] 参阅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一书附录B。

[19] 抽象本质。

[20] 一般的观念。

[21]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459~460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2] S·德雷克《伽利略》第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3] S·德雷克《伽利略》第25页

[24] S·德雷克《伽利略》第97页

[25] 通过数学知识。

[26] 理性对此无能为力。

[27] 这一提法是与“理性至上”相对应的，并且是基于“近代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的”这一认识。

[28] 智慧。

[29] 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3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30] 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第4~5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文章添加: [xionglin](#) 最后编辑: [xionglin](#)

相关文章:

安希孟: 从自然神学到关于自然的神学

陈崖倩: 从自我敞开与封闭看基督教信仰与新儒...

安希孟：近代基督教中国本色化的问题及前景
姜赞东：“上帝死了”及其历史意义
刘小枫：灵知人及其现代幽灵
安希孟：对礼仪之争的文化反思
耿开君：基督宗教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罗…
谢文郁：论中国文化中的分裂自我及其整合
周小安：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诞生
周小安：创造论传统在欧洲近代科革命中的作用…
赵林：儒家的“四端之心”与基督教的“原罪”
肖草：早期欧陆哲学视域下的神正论：从柏拉…
王晓朝：论基督教哲学的显现与发展
卓新平：基督教哲学与西方宗教精神

周小安：无辜苦难的奥秘——略论《约伯记》
尤西林：德行不再许诺幸福——《约伯记》与古…
刘小枫：真理为何要秘传？——《灵知派经书》…
段德智：从「中国礼仪之争」看基督宗教的全球…
丁果：内圣外王的困境与基督教原罪说的启示
何光沪：宗教和科学是影响人类最大的两种力量
安希孟：从分离走向整合的科学与宗教
刘宗坤：圣经中的“罪”观念 与人的生存的理解
孙毅：论祁克果关于罪的理论
张晓梅：已然未然之间：康德的“上帝之国”
李秋零：“基督教是真哲学”一说分析
安希孟：聆听的基督教哲学

点击数:5349 本周点击数:15 [打印本页](#) [推荐给好友](#) [站内收藏](#) [联系管理员](#)

相关评论（只显示最新5条）

GUEST 于2006-8-28 13:28:15

good. DJ

[更多评论>>](#)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 | [投稿须知](#) | [版权申明](#) |

| [设为首页](#) |

[思问哲学网](#) Copyright (c) 2002—2005

四川大学哲学系·四川大学伦理研究中心 主办

蜀ICP备05015881号